

南京大学CSSCI来源集刊

政治经济学报

The Chi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第13卷



Vol.13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南京大学CSSCI来源集刊

政治经济学报

The Chi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第13卷



Vol.13

孟捷 龚刚 主编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经济学报.第13卷/孟捷,龚刚主编.—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432-2683-8

I. ①政… II. ①孟… ②龚… III. ①政治经济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84887号

责任编辑 贺俊逸

装帧设计 路 静

政治经济学报(第13卷)

孟捷 龚刚 主编

出 版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2.75

插 页 2

字 数 234,000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2-2683-8/F·1174

定 价 50.00元

目 录

CONTENTS

1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3	论新时代下中国新的改革开放 ——写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之际 / 龚 刚
1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化的若干问题 ——兼评张宇等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孟 捷
44	中国崛起的秘诀与挑战 ——“新制度经济学”批判 / 文 一
83	数理政治经济学
85	商品按生产价格出售和按价值出售有区别吗? / 冯金华
101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综合结果研究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问题考察的新视角 / 陶为群
123	两种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的国际价值量 研究 / 宋树理 姚庐清
143	“三农”问题
145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多元化实现形式下的农村社会福利比较 研究 / 赵苏丹 蒋永穆

165

学术评论

167

为什么和怎样编写《经济学原理》/ 王今朝 许晨

18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思考

——第十二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2018)综述

/ 张霞 何凌云 朱巧玲

189

新书架

191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分析基础》序言/ 拉沃

194

《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第四版)序言/ 鲍尔斯

爱德华兹 罗斯福 拉鲁迪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论新时代下中国新的改革开放

——写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之际*

龚 刚**

摘 要 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进入了新时代(或新常态)。新时代意味着常态下中国已不再是“需求决定型经济”,而是“供给决定型经济”。正因为如此,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供给侧。供给决定型经济不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模式转型的逻辑起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新常态为背景,目标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此,中国须竭尽全力进行自主研发。由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建设好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为自主研发和创新提供足够的激励。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可以理解为新常态下中国试图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去寻找自己新的合作伙伴,它体现了新常态下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模式。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对外贸易应转向针对发达国家追求贸易平衡,针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鼓励用人民币进行贸易逆差,以实现与新的合作伙伴共赢经济发展,而人民币国际化和走出去战略将支撑贸易的这种转型。最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能否成功,取决于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顺利。

关键词 新常态 两阶段理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带一路”

一、引言：不言自明的假设

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本文的讨论将建立在如下不言自明的假设基础上:

- 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经济体在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不断演变,而当这种演变从量变到达质变时,经济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 15ZDA010)的部分研究成果。

** 龚刚,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金融研究院院长。

- 新的(不同的)发展阶段意味着新的(不同的)经济环境,从而对经济体形成新的(不同的)约束,由此而产生不同的经济变量的决定方式和不同的经济学理论。
- 新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必然意味着不同的经济增长动力,从而要求不同的生产方式(或增长方式、发展模式)与此相适应。生产方式的错配(即生产方式不适合现有发展阶段,或生产关系不适合现有生产力发展)必然会给经济体带来扭曲,并由此而产生各种问题。
- 经济发展战略是一国经济活动的基础,是体制设计、政策制定和行动规划的依据,是一国生产方式的具体化,从而必须契合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的经济增长动力。

在这样一个不言自明假设下,本文将论证:(1)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常态;(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常态下中国新的对内改革;(3)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是新常态下中国新的对外开放。它们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下中国新的改革开放。

二、新常态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河南论及经济形势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①这是习近平第一次使用“新常态”一词。此后,7月29日,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又一次提到了新常态:“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②12月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新常态进一步上升为中国目前及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逻辑起点。由此可见,习近平所提出的新常态事实上反映了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然而,学术界对于新常态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首先,新常态被认为是指全球经济的新常态,这与由境外学者在论述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的全球经济时首先提出新常态(New Normal)一词不无关系。其次,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过去的超高速增长是不正常的,新常态就是要回归正常,即按经济规律办事。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则是通过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美好前景的描述来对新常态进行论述。更有甚者,将新常态看成是一个政治术语和媒体术语,从而认为不具备经济学基础。

① 参见 <http://zt.ccln.gov.cn/xxxjp/zyjs12/jjjs1/8260.shtml>。

② 参见 <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5/0602/c1003-27088631.html>。

显然，以上论述都没有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来认识新常态。本文中，我们将构建发展中国家在脱离贫困陷阱后向发达国家发展的两阶段理论。这一理论将为新常态思想打下坚实的学术和理论基础。

(一) 关于经济增长的经典事实

首先，我们利用世界范围内的经验数据考察关于经济增长的一些经典事实。我们借助 Penn World Table (PWT) 数据库收集了 167 个国家（或地区）1960—2010 年间人均 GDP 水平^①，并且按人均 GDP 将 167 个国家划分为低收入（贫困）、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或地区），其中，高收入组别为人均 GDP 大于美国人均 GDP 的 60%，中等收入组别为人均 GDP 在美国人均 GDP 的 10% 至 60% 之间，低收入（贫困）组别则为人均 GDP 小于美国人均 GDP 的 10%。所有收入水平经购买力平价（PPP）折算后按 2005 年的美元衡量。^②

表 1 中，1960 年低收入组别一共有 56 个，其中有 42 个（占 75%）到 2010 年时仍然停留在低收入组别，只有 13 个（占 23.21%）升入中等收入队列，有 1 个国家即韩国越入高收入俱乐部。就中等收入组别而言，1960 年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一共有 90 个，其中有 17 个（占 18.89%）到 2010 年退入低收入组别，59 个（占 65.56%）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另外 14 个（占 15.56%）则进入高收入俱乐部。此外，1960 年高收入组别共有 21 个国家（或地区），其中有 18 个（占 85.71%）到 2010 年时继续留在高收入组别，尽管该俱乐部已由过去的 21 个增加到 33 个。

表 1 相对人均收入转移矩阵（括号内百分比数据为转移概率）

2010 年 1960 年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1960 年加总
低收入	42 (75%)	13 (23.21%)	1 (1.79%)	56 (100%)
中等收入	17 (18.89%)	59 (65.56%)	14 (15.56%)	90 (100%)
高收入	0 (0%)	3 (14.29%)	18 (85.71%)	21 (100%)
2010 年加总	59 (35.33%)	75 (44.91%)	33 (19.76%)	167 (100%)

① 参见 Feenstra, Inklaar and Timmer (2013)。

② 对于部分 1960 年数据缺失的国家，我们用其 1970 年的数据代替。对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我们用其 1990 年的数据代替。这样一种代替，对最后的结果并不具有实质的影响。

由此可见,经过漫长的50年的发展,只有13个(占23.21%)国家(或地区)从低收入成功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同时,也只有14个(占15.56%)国家(或地区)从中等收入成功转变为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即使在这14个国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依赖其天然资源(如石油)而致富的。这样一个残酷的经典事实为我们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陷阱,即贫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二) 两阶段理论

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标志在于人均产量(或人均GDP)的差异。人均产量低下基本上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现实中,这具体表现为大量的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只与有限的土地结合。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本身也意味着就整个社会而言,人均所拥有的资本(机器、设备等)较低,即宏观上,整个经济社会的生产方式主要体现为劳动密集。二是已被使用的劳动力其生产力水平低下,即技术水平落后。正因为如此,人均产量的提高(或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可以通过趋资本密集化和趋知识(技术)密集化而得以实现。人均资本的提高通常表现为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即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脱离土地与资本结合。城市也正是通过不断地投资和开工建厂来吸纳和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就整个国家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和转移过程也就是生产方式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逐渐转化的过程,即人均资本拥有量不断提高的过程。

然而,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由资本密集(或投资)所带动的人均资本和人均产量的提高是有极限的。当经济达到这一极限时,唯有技术进步才能进一步提高人均资本和人均产量。由此,我们可以将发展中国家脱离贫困陷阱后向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第二阶段是技术的追赶过程。^①当然,两个阶段有可能是部分重叠的(见图1)。



图1 脱离贫困陷阱后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

^① “两阶段理论”及其由此而引申出的供给侧改革思想是由本文作者在2008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经济》一书中首先提出(龚刚, 2008; Gong, 2012), 其观点在2010年和2012年前后多次反复强调(龚刚, 2010; 2011; 2012), 并且也可以通过构建数学模型予以阐释(Gong, 2016)。

（三）两阶段理论与发展经济学中的“拐点”理论

发展经济学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类型的拐点理论。首先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Lewis, 1954）。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初期存在着大量甚至无限的剩余劳动力，经济社会则被分隔成相对现代化的工业（或城市）部门和传统的农业（或农村）部门，而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则滞留于农村。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逐渐被现代工业部门所吸收。所谓刘易斯拐点，就是指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此时，进一步的增长将使工资快速上升。

库兹涅茨于1955年提出了发展过程中的另一种拐点理论（Kuznets, 1955）。按照这一理论，一国的收入分配状况随该国的经济发展（由人均GDP水平衡量）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这样一种变化规律可以用所谓的库兹涅茨曲线来进行表示。借助该曲线，我们可以找到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拐点”。

我们可以证明^①：刘易斯“拐点”和库兹涅茨曲线中的“拐点”是相互联结的，它们所代表的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同一状态。在经济发展初期，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或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必然使工资的上涨速度缓慢，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例下降，即收入分配持续恶化。而当劳动力开始逐渐变得紧缺时，工资的上升速度会相应加快，并且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例出现逆转，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将会出现。由此我们看到刘易斯拐点和库兹涅茨拐点之间的联接。

此外，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消化（或接近消化）之时，该国一般也会进入中等收入行列。而根据前文关于经济增长的经典事实，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后，其向发达国家的发展绝非自然而然，其间很有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由此，我们可以将发展中国家脱离贫困陷阱后的两个发展阶段之特征做如下概括：

- 第一阶段：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此时，经济处在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库兹涅茨曲线前半部分，属低收入国家（或地区）；生产方式从劳动密集逐渐向资本密集过渡。
- 第二阶段：技术的追赶过程。此时，刘易斯拐点出现，经济处于库兹涅茨曲线后半部分，属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生产方式从资本密集向知识密集转型。

^① 参见Gong（2013, 2016）。

(四) 新常态意味着中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

按照相关研究^①, 贫困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很低时, 人们会用绝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 以维持基本的生存状态, 从而储蓄率非常低, 缺乏用于发展工业化的资本积累, 经济增长出现停滞。按照贫困陷阱理论, 常规的市场经济无法让一个处于生存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走出贫困陷阱。脱离贫困陷阱, 必须越过“门槛”, 在短期内大量投资, 即所谓的“临界最小努力”。显然, 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完成这样一种“临界最小努力”的。例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帮助了自己的许多盟国(如韩国、日本等)走出了贫困陷阱。

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 经过前30年的艰苦奋斗, 中国通过计划经济和城乡分治, 走出了贫困陷阱——尽管其中经历了许多曲折, 走过了许多弯路。^②1978年, 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中国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之前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 开始了其史无前例的向西方学习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历时40年, 它使中国从过去封闭的、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经济转向了开放式的市场经济。正是这样一种转变使得中国在脱离贫困陷阱后, 迅速进入了连续40年高速增长的轨道。

然而, 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 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在中国已不复存在。现实中, “招工难”和“招工局长”等情况已经在东部沿海地区不时出现。有关研究显示, 中国当前的综合失业率约在6.6%(徐文炯, 2015)。这一失业率水平低于西欧发达国家(如法国等)的失业率。剩余劳动力的短缺也必然意味着工资上涨快速(快于GDP的增长速度), 从而收入分配开始好转, 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开始出现。例如, 按照亚开行的研究, 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最高值0.491; 2015年则降为0.463(庄巨忠, 2016)。此外,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资本密集型经济之特征。例如, 中国的钢产量已经连续十几年占据世界第一。进一步增资扩产的空间已经很小。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经济在现实中必然意味着以大项目来“吻”增长, 而产能过剩也通常集中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如钢铁业等)。

综上所述,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走出贫困陷阱后向发达国家发展的第二阶段, 即新常态。

三、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在2014年5月提出新常态之后, 很快又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

^① 如 Nelson (1956) 等。

^② 从这个意义上说, 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并非一无是处。

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①这一概念一经提出，不同的经济学家、媒体和官员就开始对其进行各种不同的解释，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解释是“三去、一降、一补”。例如，国家发改委2016年7月15日的文件一开始就说：“完成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②然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三去、一降、一补”吗？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三去、一降、一补”吗？

“三去、一降、一补”是2015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2016年部署的五大任务，这种年度工作会议本质上是解决经济当前所出现的短期问题，经济学中称之为商业周期问题。如果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仅仅理解成解决短期问题，则无疑大大降低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考察一下“三去、一降、一补”的一些具体措施：去杠杆——债务置换；去产能——一刀切按比例关掉一些锅炉；降成本——采取降价（电价）；等等。这些难道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吗？再者，如果“三去、一降、一补”实现了（事实上，“三去、一降、一补”在最近的官方文件中已不再提及），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顺利完成了？毫无疑问，“三去、一降、一补”本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

对于写入党章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需要与习近平的另一个经济思想——新常态——联系在一起，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因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的变化达到了从量变到质变，从而要求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以新的生产方式来适应新常态（或新的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发展）。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的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长期增长问题，决不是“三去、一降、一补”等短期（或周期和波动）问题，它体现了习近平的对内经济改革。

（二）供给决定型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

那么，为什么推动经济长期增长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知道，在这之前无论是在官方、媒体还是在经济学家的眼里，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需求侧，是需求侧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于是我们不得不问：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而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①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6-01/14/c_1117776578.htm.

② http://www.sdfgw.gov.cn/art/2016/7/15/art_1141_201402.html.

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常态下（即不考虑临时性的经济波动而只考虑经济增长问题时）中国已不再是一个需求决定型经济，而是供给决定型经济。所谓供给决定型经济是指经济体的产量由其供给侧所形成的生产能力（由劳动力供给、资本设备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组成）决定，而不是由需求（即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所决定。

也许有人会认为，尽管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是紧缺的，但中国的许多行业存在着产能过剩，因此，很难认定中国是一个供给决定型经济。

然而，第一，劳动力从大规模剩余转向短缺（或脱离土地与资本结合）反映的是经济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是一种不可逆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结构变迁，从而必然体现为经济的发展过程从量变达到了质变。正因为如此，它必将改变经济环境，对经济体形成新的约束，由此而产生新的不同的经济变量的决定方式。常态下经济社会从需求决定型转向供给决定型正是反映了这种质的转变。

第二，与劳动力从大规模剩余转向紧缺相比，产能过剩通常只是一种短期现象，正因为如此，在许多情况下是可以利用经济学中解决短期商业周期问题的宏观调控政策，如凯恩斯需求管理型的宏观经济政策予以解决。“三去、一降、一补”正是这样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

第三，现实中，任何产能的运行都需要劳动力。当经济社会总体上存在着劳动力短缺时，需求增加，即使是那些过剩产能行业的需求增加，也只能使劳动力因工资的高低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其结果必然是某些行业的产量会增加，某些则会减少，总体则增加有限，甚至不增加，但通货膨胀则因工资的上升而加速。正因为如此，只要劳动力短缺，经济社会总体上就是一个由劳动力供给所决定的供给决定型经济。

由此，我们发现，新常态（或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意味着常态下中国已不再是一个需求决定型经济，而是供给决定型经济。供给决定型经济不仅是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中国对外贸易模式转型的逻辑起点。^①

（三）以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

在供给侧的三个要素中，劳动力供给是外生的。资本由投资所累积，而投资本身是一种需求，如果投资不能带来或体现为技术进步，则投资只能引发产能过剩。因此，当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技术进步就成为从供给侧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唯一动力。事实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本质上源于技术进步的不足。

^① 详见之后的讨论。

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经济增长的动力既包括由资本投入（或投资）所带动的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同时也包括技术投入（或技术进步）。这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动力充沛。在第二阶段，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存在，因此，经济增长的动力只能来自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增长动力减弱。更为严峻的是，在第二阶段，即使是技术进步也变得更为困难。技术进步可分为引进型技术进步和自主引发型技术进步。中国过去的技术进步最主要的源泉就是技术引进。然而，随着中国的技术水平逐渐接近国际前沿，技术引进的空间将越来越小，这无疑让引进技术的模式走到了尽头。因此，在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技术进步的主要模式只能是自主研发。

然而，自主研发式的技术进步绝非易事。首先，前期发展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和所养成的惰性使得发展中国家很少有意愿和能力去进行自主研发。其次，自主研发本质上是和发达国家竞争，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胆量。最后，自主研发需要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包括高质量的技术人员和大量的研发经费等。一般地，研发投入的每一百个立项，到最后大约只有五个可以取得申请专利；在十个申请专利的技术中，大约只有一两个具有商业价值（林毅夫，2003）。发展中国家正是因为长期依赖技术引进，缺乏自主研发型的技术进步，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由此，发展中国家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发展绝非自然而然，期间很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中国家必须竭尽所能进行自主研发，实现其自主研发型的技术进步率大于前沿国家的技术进步率，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

（四）建设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

然而，在没有引进和模仿条件下，自主研发型的技术进步是如何实现的？其机制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保障？

传统上，人们通常认为技术创新会自然地发生在“硅谷的车库”，这显然忽略了技术创新过程的复杂性、阶段性和所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事实上，任何一个经典和有意义的创新都应被理解为产生于特定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

国家创新体系是指由公共和私营机构（包括个人、企业、大学、金融机构和政府研究机构等）所形成的网络，在该网络体系中，人们的交流活动和相互作用使得新技术的研发能得以启动、持续和传播，并最后通过商业化形成实质的生产力。

阿特金森（Atkinson，2014）将国家创新体系归纳为三个方面：商业环境、管制环境和创新环境（见表2）。

表 2 国家创新体系

商业环境	管制环境	创新环境
<u>企业制度</u> 管理者天赋、时间维度、风险偏好、信息化程度等。 <u>金融体系</u> 风投基金、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商业银行体系等。 <u>文化因素</u> 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如是否愿意尝新等）、冒险精神、对科学的姿态和尊重、合作习惯和时间维度等。	<u>管制体制</u> 对垄断的容忍、行业的壁垒、设立公司的难易程度、管制的形式和作用、法律的透明度等。 <u>税收、贸易和政策</u> 宏观经济环境、税收政策、贸易政策、专利保护政策和商业标准化政策等。	<u>研发体系</u> 大学研发体制、科研机构和国家实验室的研发体制、对企业研发的支持等。 <u>知识的流动体系</u> 技术转移系统、创新园区（或集群）、产学研协作系统、技术的应用和传播系统等。 <u>人力资源体系</u> 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技术和技能培训、移民政策等。

商业环境包括企业制度、金融体系和文化因素等。其中的企业制度决定了企业行为，并且通过管理者天赋、企业决策时所考量的时间维度和企业的风险偏好程度等对企业行为进行反映。例如，时间维度对创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个追求短期利益的企业是不可能进行创新的，而在中国现有干部体制的激励下，追求短期利益是许多国有企业的通病。^①金融体系（特别是其中的风投基金等）在创新体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许多“硅谷车库”中的创新如果没有风投基金的支持是不可能产生奇迹的，而股票市场能否有效地让科技创新型企业上市，也是技术创新过程中商业化的重要一环。

管制环境对垄断和行业进出壁垒的容忍将严重阻碍企业的创新：一个获得垄断保护的企业是不可能拥有创新的激励。此外，对处于发展阶段的创新型企业进行税收减免和对专利进行保护等显然也会促进和鼓励创新。

就创新环境而言，人力资源体系和研发体系生产和积累知识和技术人才，它们是一个国家创新的源力。而知识流动体系则反映了知识在不同的人、机构和企业间的流转、扩散、融合和发展，并最后向商业化转移的流畅程度等。例如，在苏联，其研发投入常为 GDP 的 4% 以上，远远高于一般的发达国家。然而，其中的 70% 用于军事，与此同时，其技术（知识）传播的军转民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从而其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并没有给经济带来高增长。^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首次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之概念。2018 年 1 月 30 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所进行集体学习中更是强调：“强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加强国家创新体系

① 详细讨论请参见龚刚（2016，2017）。
② 参见 Mazzucato（2011）。